

# 挖坑挖出一个惊世大发现

## ——市博物馆部分文物背后的故事

□晚报记者 王晨 郭坤 实习生 王国强 黄晓慧 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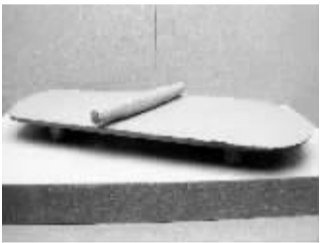
7月1日,周口市文化艺术中心内的市博物馆向市民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它的开放不仅标志着周口有了市级博物馆,还让市民通过参观大量馆藏文物直观地了解周口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自开馆以来,市博物馆每天都会接纳众多参观者。走马观花地将千余件文物浏览一遍后,参观者大多会留下“没想到周口还真有些东西”的感慨。感慨之余,他们还生出些许遗憾:这些文物从哪里来?珍贵在何处?背后又有着哪些故事……

将千余件文物全部详加介绍显然不太现实,不过,记者从市博物馆了解到,错金越王剑、楚国银布币等6件文物颇吸引参观者眼球。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市博物馆馆长周建山,让他为读者一一解读它们背后的故事。

在人类文明初露曙光之际,裴李岗人已经具有非凡的能力,他们利用自己的双手和从猿向人类过渡时期极为有限的智慧,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请看:

**石磨盘——裴李岗文化杰出代表**



石磨盘长100厘米,宽44厘米,厚13厘米,以整块砂岩磨制而成,略成鞋履形,两头呈椭圆形,两边呈直线,上面平坦,下有4个圆柱状足(石磨盘上的石棒是为了还原当时的劳作场景,后添加的)。“和裴李岗文化同类器相比,该石磨盘形体之大为迄今之冠。”市博物馆馆长周建山语透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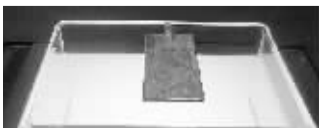
裴李岗文化是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早期文化,它的发现给中国的远古文明涂抹了一层神奇莫测的独特风采。裴李岗人利用自己的双手和从猿向人类过渡时期极为有限的智慧,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

1988年在扶沟县出土的这块石磨盘以实物证明了裴李岗人的智慧。新石器时期,先民在没有先进打磨工具的情况下,将整块砂岩打造成长约100厘米的石磨盘,是需要很大的精力、毅力、智慧的。它的发现颇具偶然性,是当地一位农民在犁地时发现的。当时,扶沟县考古人员闻讯后,立即前往查看,并推测附近应有一根石磨棒。考古人员在现场查看一番后虽没有发现石磨棒的踪迹,但发现了一些红陶片等器物残片,考古人员由此推断,扶沟曾出现过裴李岗人的足迹。

周建山介绍,裴李岗文化在周口的分布范围很广,除了淮阳、郸城、川汇区没有发现文化遗迹外,其他各县均发现了裴李岗人的历史生活痕迹。裴李岗文化在周口的普遍分布,说明了周口一带是我国传统农业的发源地,是农业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

它是我国首次发现,也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银币实物。它将我国使用银币的历史从汉代提前到东周时代,在我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请看:

**楚国银布币——我国最早银币实物**



1974年7月31日,扶沟古城村古北大队副支书孙本立想挖一个大坑用来淋石灰,没想到,却挖出了一个惊世大发现——一个“水壶”和一个“香炉”。抠掉上面的泥土,青色的铜锈露了出来。

“水壶”里有一堆黄灿灿的东西,“香炉”里有一二十个白色的像“锅铲”一样的东西。

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的郝本性推断,黄的是金币,白色“锅铲”是银布币。盛金币的“水壶”是铜壶,盛银布币的“香炉”是铜鼎,由于年代久远,铜壶和铜鼎锈结在了一起。

此次发现的392块金币、12块银布币、铜壶、铜鼎一并被送到省里。当年年底,扶沟又有农民陆续上缴了6块银布币。这6块银布币,由扶沟县文化馆负责文物工作的郝万章保管。1984年,扶沟县博物馆成立,6枚银布币转交给了扶沟县博物馆保管收藏。1990年,为了重要文物的安全,这批银布币被送到淮阳文物库房保存。周口市博物馆开放后,银布币又静静地躺在了这里的展柜里。

研究发现,这批金银币为战国时期楚国货币,它的出土轰动了全国,具有重大文物价值。其中最珍贵的是这18块银布币。布币是楚国的专用货币,银布币用银子制成。扶沟出土的银布币为我国首次发现,也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银币实物。此前,仅在书中有使用银币的记载。它的出土,可以充分证实,先秦时代确实使用过白金货币(古人用白银充当货币进行交易,并称银为白金,意指白色的金属),并将我国使用银币的历史从汉代提前到东周时代,在我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越国之剑,闻于天下。越国的铸剑师们精确地掌握了铜、锡的配比,熟练地掌握了宝剑的防锈工艺、熔模铸造工艺等其他铸剑工艺,才使得越国之剑独步天下。请看:

**错金越王剑——闪耀寒光**



越国故地在今江浙一带,淮阳地处中原大地,古称陈城或陈县,属于楚地国土。地理位置上,两者相距甚远,而在1979年,淮阳发现了一把本应在江浙一带出土的越王剑,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如今这把闪着寒光的错金越王剑静静地躺在周口市博物馆内。

1983年8月,淮阳县公安局在

侦破淮阳文物盗掘事件中查抄到一把错金越王剑,专家推测其应为淮阳平粮台一带楚墓所出土。这把剑长59.9厘米,宽5.4厘米,圆首,圆柄,柄上无箍,至今保存完好,尖锐锋利。剑格和剑首上用错金工艺嵌刻有鸟篆“越王”铭文,专家们通过对剑身铭文的解读,证明此剑为越王剑。错金越王剑,是战国时期铸剑师为越国国王所作的剑,乃当时剑中极品,是我国兵器史上最珍贵的文物之一。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曾在平粮台4号楚墓中发现有一把造型与此相同的错银越王剑。

对于这把错金越王剑如何跑到中原一带,这要从陈楚关系说起。陈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中原大国,至公元前479年为楚国所灭,成为楚国北方的军事重镇。公元前278年,秦国名将白起攻破楚国的郢都(今湖北江陵),楚顷襄王被迫迁都于陈城即今淮阳。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病逝,其子楚考烈王继位,仍将陈城作为楚国国都。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为避开秦国威胁,遂都于寿春。楚国都城长达38年之久,其间包括楚顷襄王在内有不少楚国贵族长眠于今淮阳一带。

为何错金越王剑、错银越王剑出土于楚墓?历来众说纷纭。多数专家认为,它们应是楚国灭越国后的战利品。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们是越国成为楚国附庸后的贡品,后来随着楚人都陈而随葬于楚墓中。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社会经济文化取得全面的发展,在工艺美术方面,汉代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请看:

**四神博局纹铜镜——纹饰精美**



这面四神博局纹铜镜直径16.4厘米,厚0.5厘米,圆形,半球形,镜内区饰12个小乳钉呈正方形排列,乳钉间刻有十二地支。外区饰八乳钉和四神规矩纹,向外还有一周铭文带,铭文为:“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主四旁,朱雀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居毋自欲起王氏阳,家大富宜侯王。”

这面铜镜是1982年项城县蛤蟆寨行政村(今属项城市光武办事

处)一家窑厂在取土时发现的。当时,一位民工发现这面铜镜后,便带回了家。因其他人举报,当地警方将铜镜追缴回来。这面铜镜品相完好,未见明显锈迹,正面至今仍可照人,背面所绘纹饰精美,仔细观察可清晰分辨纹饰中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种神兽图案和一些“L”“T”“V”符号。这面铜镜是汉代铜镜的杰出代表,反映了汉代工艺发展水平的高度。

铜镜背面的“L”“T”“V”符号是考古界所说的博局纹,也称规矩纹,是汉代铜镜中常见的一种纹饰,过去中国和日本学者称之为“规矩纹”,欧美学者则称之为“TLV纹”。

有关博局纹镜的名称,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分歧:一称为规矩镜,理由是认为镜背“T”“L”“V”等纹饰与日晷盘上的纹饰相似,故自后就有“天圆地方”之说。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把这种纹饰称之为“博局纹”,故名为博局纹镜,所谓博局,指的是古代的国棋盘,即博戏,也称六博。博戏棋艺,春秋时期出现,汉代盛行。善博者在社会上很受人们尊敬。西汉王朝还专门设有博待诏官一职。《汉书·五行志》记载:“哀帝建平四年,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河西王母。”

**绿釉卧羊樽——神态安详**



这座汉代绿釉卧羊樽体呈卧羊状,昂首平视,口微张,角向后卷曲,顶有一小圆形口,小尾,四足做跪卧状,通体施绿釉不过底。

1979年5月,项城县蛤蟆寨行政村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一座汉墓。随后,考古人员对此墓进行清理时,发现一对绿釉卧羊樽。1984年10月,周口市文化馆将它们移交给刚成立的项城县博物馆,但其中一只在1997年被征调至河南博物院。

羊寓意吉祥,古人常把器物做成羊的造型,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这座卧羊樽造型美观别致,独具匠心,卧羊比例协调,神态安详,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风格。釉色碧绿明净,是汉代铅釉陶中的珍品,为东汉时期的典型明器,能较好地反映当时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汉代能拥有这种卧羊樽的人,不会是普通平民,其身份地位应该

很高。这座卧羊樽的出现说明项城一带在汉代就是一处经济文化相当繁荣的地区,人们生活比较富裕。汉代厚葬之风盛行,这座卧羊樽在此处出土也是情理之中。

宋朝瓷器,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竞风流的气象为中华民族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丰碑。其刻、划、剔、印、堆塑等技法地大量采用,极大地丰富了瓷器的表现力和艺术性。请看:

**白釉剔刻花罐——同类瓷器的代表之作**



在周口市博物馆,有这样一件瓷罐,它出土于淮阳,保存的相当完好。釉色明亮匀净,纹饰精美流畅,比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同类瓷罐更为精美,全国亦无出其右者,为同类瓷器的代表之作。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为研究中国瓷器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对中国瓷器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件瓷罐就是举世闻名的宋代当阳峪窑白釉剔刻花罐。

1999年在对淮阳县南坛湖改造工地进行的文物勘探中,周口市文物考古管理所发现了春秋、战国、两汉、宋、金时代中小型墓葬100余座,后派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其中一座宋代中型砖室墓出土一件保存完好的瓷罐,周建山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发现这件珍宝时,他激动地手舞足蹈。“晚发现半个小时,挖掘机一动土,这件珍宝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根据相关史料的推定,省市专家判断该瓷罐属于宋代当阳峪窑白釉剔刻花罐,十分罕见。

这件瓷罐形制为唇口,筒形腹,腹部稍广,圈足,口底大小相若。该器高17.9厘米,口径9.4厘米,底径9.3厘米。深褐色胎,紧致,乳白色釉略泛青黄,晶莹光亮。器表有很深的剔刻花纹,上下部为相对的覆仰莲瓣纹边饰,中部刻划缠枝菊花纹。剔刻花罐综合运用了剔、刻、划的装饰技法,以剔、刻为主。图案中以缠枝牡丹为最多。纹饰流利洒脱,又以黑白、褐白对比强烈的色彩独具一格,其艺术感染力远在磁州窑系同类器装饰之上。纹饰流利洒脱,又以黑白、褐白对比强烈的色彩独具一格,其艺术感染力远在磁州窑系同类器装饰之上,实属同类极品。